

汉昭帝时期乐府研究^{*}

——以《盐铁论》为中心考察

龙文玲

内容提要 根据《盐铁论》、《汉书》等文献就汉昭帝时期乐府进行研究，得出三点结论：一、此期乐府仍存在并开展了祠太一、祀山川、接待外宾等歌舞百戏活动，承担着管理乐器、采集民歌等职能。二、以霍光为首的官吏反对滥用乐舞，肯定乐府观风知俗的政教功能；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吏则肯定郑卫之声，追求乐府的娱乐功能；在野的贤良、文学强调乐府的礼乐教化功能，反对僭越用乐，主张节制用乐。这些对乐府乐舞的不同态度都对后来西汉乐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三、尽管此期乐府相对沉寂，但它保留了传统，在乐府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作用；此期歌诗多反映当时人们对政治价值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值得珍视。

关键词 汉昭帝时期 乐府 《盐铁论》

说起西汉乐府，人们往往提到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的盛况，而对处于武、宣两个乐府发展高峰间的汉昭帝时期乐府却鲜有论及。那么，汉昭帝在位十三年的乐府机构存在状况如何？开展了哪些活动？当时朝野对乐府的态度怎样？这时期乐府在西汉乐府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故笔者不揣浅陋，以《盐铁论》为中心，把汉昭帝时期乐府放在西汉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拟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一 汉昭帝时期乐府活动的文献考索

因文献记载少而零散，学术界对汉昭帝时期乐府的认识迄今较模糊，现有关于西汉乐府的研究成果对此基本不涉及，足以证之。但乐府机构在昭帝时期依然存在并有活动，毋庸置疑。

汉昭帝时期乐府机构的存在及其活动情况，正史中有透露。如《汉书·霍光传》载霍光与群臣连名奏废昌邑王刘贺的奏疏，其中列刘贺罪状云：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①

这段话至少透露了四个信息。第一，刘贺在为汉昭帝典丧期间令人“发乐府乐器”，这里的“乐府”必是承自昭帝时期，因刘贺在位仅二十七天，且尚在典丧，不可能来得及设立新机构。第二，刘贺“发乐府乐器”，说明昭帝时期的乐府机构承担着管理乐器的职能，而这一职能乃沿自汉初^②，可见乐府机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盐铁会议与西汉社会转型——以《盐铁论》为中心考察”成果之一（批准编号 20090450529）。

^①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40 页。

^②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第 1043 页）

构的职能在西汉具有一定稳定性, 尽管昭帝时期乐府活动相对少, 但其基本职能并未改变。第三, 刘贺所召乐人中有泰壹宗庙乐人。所谓“泰壹”, 亦称“太一”或“泰一”, 是汉武帝为配合皇权独尊而树立的至上神。自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于甘泉立泰畤祠太一后, 祠太一就成为汉乐府的一项重要而盛大的活动。据《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 以昏时夜祠, 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①可知武帝时乐府中负责太一祠祀的乐人至少有僮男僮女七十人。而祠太一的活动在昭帝时仍然保留, 否则就不会有刘贺召太一乐人供其娱乐之事。第四, 刘贺令乐人“鼓吹歌舞, 悉奏众乐”, 说明当时乐府的乐曲、乐歌都比较丰富。

《汉书》还透露, 汉昭帝时期仍保持着采集歌谣以观民风的传统。据《汉书·昭帝纪》载: 始元元年(前86), “九月……闰月, 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 举贤良, 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②。自汉武帝扩大乐府职能后, 朝廷官员在循行郡国了解民情时, 常带有采集歌谣的任务, 如《汉书·宣帝纪》载: 元康“四年(前62)春正月……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问鳏寡, 览观风俗, 察吏治得失, 举茂材异伦之士”^③。循行官吏在“存问鳏寡, 览观风俗”之际, 当伴随有采诗观风的行为。在此还可以《汉书·韩延寿传》的一段记载作为旁证: “颍川多豪强, 难治……延寿欲更改之, 教以礼让, 恐百姓不从, 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 设酒具食, 亲与相对, 接以礼意, 人人问以谣俗, 民所疾苦, 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④这里记载的虽是汉宣帝初年的事, 却透露了西汉官吏搜集民谣以观风俗的具体方式。韩延寿为了解颍川民间疾苦, 召集百姓代表, “人人问以谣俗”, 这应是西汉朝廷采集民谣的一种常用方式。此亦为王平等循行郡国了解民情作了一个绝好的注脚。

西汉子部文献《盐铁论》对汉昭帝时期的乐府活动也有记载。此书是汉宣帝时期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 其文献价值尤堪重视。此书《崇礼》通过桑弘羊和贤良的对答, 展现了昭帝时期的乐府活动情况:

大夫曰: “……炫耀奇怪, 所以陈四夷, 非为民也。夫家人有客, 尚有倡优奇变之乐, 而况县官乎? ……” 贤良曰: “……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贄献者, 怀天子之盛德, 而欲观中国之礼仪, 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 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 奇虫不畜之兽, 角抵诸戏, 炫耀之物陈夸之, 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⑤

桑弘羊所说的“县官”陈四夷的“倡优奇变之乐”、贤良所说的“角抵诸戏”, 皆属乐府管辖。这段对答说明, 昭帝时期曾以四方珍奇和乐府乐舞接待外宾, 其目的不仅仅是为娱乐宾客、和睦四邻, 更是为炫耀汉帝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优势。这一接待外宾的方式显然是秉承了汉武帝时期的传统。《史记·大宛列传》就记载道: “是时上(指汉武帝。笔者注)方数巡狩海上, 乃悉从外国客……于是大觳抵, 出奇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 行赏赐, 酒池肉林, 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 见汉之广大, 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觳抵奇戏岁增变, 甚盛益兴, 自此始。”^⑥《汉书·西域传赞》亦云: “天子负黼依, 袭翠被, 冯玉几, 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 作巴俞都卢、海中矲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⑦这些材料证明, 昭帝时期乐府继承了武帝时期的旧例, 承担着以乐舞活动接待外宾的职能。

《盐铁论·散不足》还通过贤良对当时社会奢靡享乐之风的抨击, 侧面反映了昭帝时期的乐府活动情况:

① 《史记》卷二四《乐书》,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1178页。

② 《汉书》卷七《昭帝纪》, 第220页。

③ 《汉书》卷八《宣帝纪》, 第258页。

④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 第3210页。

⑤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崇礼》, 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437页。

⑥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第3173页。

⑦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第3928页。

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铎追人，奇虫胡妲。

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傩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

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儻赵讴。^①

这三段乐舞描述虽未直斥朝廷，但透过其表层宣示义，不难发现其实是批判了朝廷的奢侈乐舞享乐，为研究昭帝时期乐府活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第一段引文讲到“百兽马戏斗虎，唐铎追人”，展现了驯兽、杂技等百戏场景，这一描写与前引《盐铁论·崇礼》所述乐舞场面颇相似，参以《旧唐书·乐志》“《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②，可知贤良在此实是影射了当时乐府散乐百戏的情景。再有，这段引文中提到“蒲人”，王佩诤先生《盐铁论札记》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永昌府保山县有蒲人，《牧誓》微、卢、彭、濮诸濮地，与哀牢相接。’按蒲、濮今作𡗗，近更号𡗗彝，即旧称白夷者也。蒲、濮、𡗗、白均一声之转。”^③据《汉书·地理志》，西汉犍为郡有𡗗道县，“巴、蜀、广汉本南夷……南贾滇、𡗗僮”^④，知𡗗人为西汉西南少数民族之一。汉昭帝时期乐府中有专为戏弄的𡗗人、有胡妲，说明此期乐府与武帝时期一样，都兼容了少数民族乐舞。

第二段引文讲到“祈名岳，望山川”使用乐舞之事。所谓“望”，据《尚书·尧典》：“舜……望于山川，遍于群神。”^⑤《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之事。……望，祭也。”^⑥《穀梁传·僖公三十一年》范宁注引郑玄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⑦《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⑧可知“望”是古代祭祀名山大川的一种重要郊祀礼。按《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⑨有资格望祀山川者，唯天子与诸侯，普通富人是无此资格的。所以，贤良在此名为抨击富人，实则影射朝廷望祀仪式的奢华。在望祀山川时“椎牛击鼓，戏倡傩像”，这样的乐舞场面显然很热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在汉哀帝罢乐府官之前，西汉乐府乐人中有专门的鼓员、倡员和象人。所谓象人，《汉书》孟康注云：“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⑩也是汉代百戏人员的一种。因此，这段话实际展现了汉昭帝时期望祀山川时使用乐府歌舞百戏的盛大场景。

第三段的乐舞描写中提到“五乐”，据《汉书·郊祀志上》描述舜举行郊祀，“修五礼五乐”^⑪，颜师古注云：“五乐，谓春则琴瑟，夏则笙竽，季夏则鼓，秋则钟，冬则磬也。”^⑫而备五乐以供郊祀、娱乐活动，也是乐府具有的职能之一。在汉哀帝罢乐府官前的乐府乐人设置中，就有鼓员、钟工、磬

①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六《散不足》，第349、351—352、353页。

② 《旧唐书》卷二九《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2页。

③ 王佩诤《盐铁论札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1页。

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⑤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三《舜典》，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

⑥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二，第2263页。

⑦ 《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第2403页。

⑧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5页。

⑨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曲礼下》，第1268页。

⑩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5页。

⑪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1页。

⑫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2页。

工、竽工员、琴工员、张瑟员、治竽员、竽瑟钟磬员等^①，按颜师古注“竽，笙类也，三十六簧”^②，竽、笙乃同类乐器。由此可知，为配合郊祀活动，汉乐府设置了演奏五乐的乐人。既然如《汉书·郊祀志上》所云，“五乐”是天子郊祀所备之乐，那么，在以礼乐明等级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能齐备五乐者，亦非普通富人。因此，贤良在此实借抨击“富者”用乐奢华，委婉批判了朝廷以乐府五乐、歌儿来奢侈娱乐的现象。

由以上的文献钩沉梳理不难看出，汉昭帝时期乐府机构依然存在并开展着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祠太一、祀山川、接待外宾等歌舞百戏等，同时还继续承担着管理乐器、采集民歌等职能。

二 汉昭帝时期朝野士人对乐府的态度

纵观西汉历史不难发现，乐府发展昌盛时期，也是西汉经济强盛时期。乐府乐人的供养、乐府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到汉昭帝时期，“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③。由于国家经济极困顿，朝野人士对经费开支较大的乐府机构的态度也不一致。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对此后西汉乐府的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首先看朝廷官吏的态度。当时的朝廷官吏又因各自政治遭遇、政治地位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分别以霍光和桑弘羊为首分为两派。

霍光为霍去病同父异母弟，汉武帝元狩年间随霍去病至长安任郎官，从此步入仕途。在随侍武帝二十余年中，他小心谨慎，深得武帝信任并在临终前任其为大司马大将军，令其行周公之事，辅佐年仅八岁的昭帝^④。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位在丞相之下、御史大夫之上。但当时丞相田千秋审时度势，即使在激烈论争的盐铁会议上，他也“括囊不言，容身而去”^⑤；而昭帝在位的十三年中皆委任霍光，未尝亲政，因此，这一时期基本如《汉书·霍光传》所云，“政事壹决于光”^⑥。故霍光对乐府的态度如何，对当时乐府活动的影响应当比较大。今存文献中能反映霍光对乐府的态度材料较少。一是前引《汉书·霍光传》载录的霍光与群臣奏废刘贺的奏疏。霍光在奏中将刘贺居丧间发乐府乐器等作为废帝理由之一，说明他反对滥用乐府乐舞。

桑弘羊对乐府的态度在《盐铁论》中有集中体现。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贾之家，十三岁就以过人的心算才能入宫为侍中^⑦。在此后六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他长于经济运筹，辅佐汉武帝实施了盐铁专卖、均输、酒榷等经济调控政策，使武帝朝在连年征战的巨大财富耗费中暂时度过了危机，深得武帝赏识并在临终前命其为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一起辅政。他本人也随政治地位的上升不仅获得俸禄赏赐，而且凭其官商结合的优势从事商业活动，获取了一般商人不能得到的巨大利益。他在《盐铁论·贫富》中所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⑧就是最佳证明。在掌握大量财富的基础上，桑弘羊热衷于乐舞享乐，在

①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3—1074页。

②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5页。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第233页。

④ 参见《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1—2932页。

⑤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〇《杂论》，第614页。

⑥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2页。

⑦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颜师古注：“不用筹算。”（第1164、1165页）

⑧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四《贫富》，第219—220页。

盐铁会议上,他面对文学的“贵人之家……中山素女抚流徽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的批评,以“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辩护,认为权贵之家的乐舞享乐是正当的。并提出:“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①旗帜鲜明肯定郑卫之声。为维护既得利益,他坚持“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②的观念,坚决维护武帝时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政策,其中就包括对乐府乐舞娱乐活动的肯定。如在《盐铁论·崇礼》中,桑弘羊指出,官府以倡优奇变之乐招待四夷是合理的,肯定了乐府乐舞应具有娱乐人心的功能;他还认为,用乐舞百戏来接待外宾,辅以“列羽旄,陈戎马”的武力炫耀,可以“示怀广远,明盛德”,达到“远国莫不至”的政治目的。透过贤良对乐府“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③的抨击,不难看出,桑弘羊所肯定的乐府乐舞显然不是“进旅退旅,和正以广”^④的《雅》、《颂》古乐,而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⑤的新乐,是他乐于欣赏的郑卫之声。桑弘羊对乐府所持的这一态度,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发扬汉武帝乐舞观念的因素。《汉书·礼乐志》即载,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河间献王刘德来朝献其所集雅乐,但“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⑥。在汉武帝的表率、桑弘羊等官吏的弘扬下,“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⑦。

再看昭帝时期在野士人对乐府的态度。此期在野士人的乐府态度也集中体现在《盐铁论》中。据《盐铁论·杂论》,当时“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参以《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前82),昭帝下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始元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⑧。可知参加这次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都来自三辅和各郡国,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在野士人的心声。透过桑弘羊在《盐铁论·地广》中对文学“禄不过秉握”、“家不满檐石”、“皆贫羸,衣冠不完”,却要“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谤訾议”的讥讽,不难发现这些贤良、文学的经济与政治地位都较低,但都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们不仅就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刑法等国家大政提出了意见,而且对文化思想建设发表了看法,其中就包括了对乐府的看法。由于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接受教育的情况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贤良、文学对乐府的态度与朝廷官吏也有明显不同。在贤良、文学那里,他们秉承儒家礼乐传统,强调礼乐的政教功能。他们对乐府的态度,具体表现在:

第一,强调乐府的礼乐教化功能。在先秦儒家那里,就一贯重视礼乐的政教功能。《论语·子路》载孔子回答子路的为政问题时就提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⑨把礼乐兴视为刑法中的重要前提。《荀子·乐论》也认为统治者应制定雅乐,以达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⑩的目的。《礼记·乐记》还指出:“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①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相刺》,第254页。

②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忧边》,第162页。

③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崇礼》,第437页。

④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八《乐记》,第1538页。

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九《乐记》,第1540页。

⑥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0页。

⑦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1页。

⑧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3页。

⑨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一三《子路》,第2506页。

⑩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四《乐论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9页。

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①这些阐述，都充分肯定了礼乐在社会政治、伦理教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受此观念影响，贤良、文学高度肯定了礼乐的政教功能。如《论诽》中，文学就合用《论语·子路》和《礼记·乐记》的话，指出：“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②认为兴礼乐对移风俗、理国政有重要作用。《遵道》中，文学又以“师旷之调五音，不失宫商”与“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相比附^③，将音乐与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本着对礼乐政教功能的重视，贤良、文学认为当以《雅》、《颂》古乐昭德明礼，怀柔远方，反对郑卫之声。如《崇礼》中，贤良就先对当政者以乐府倡优奇变之乐和百戏招待外宾提出批评，然后指出其应向周公那样，“处谦以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贡，见恭让之礼也；既，与入文王之庙，是见大孝之礼也。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④。主张利用乐舞感化人心的功能，用典雅庄重的《雅》、《颂》古乐接待外宾，以达到弘扬汉帝国的礼乐文明、彰显汉天子的功德、感化四夷使其自愿归附的政治目的。

第二，重视乐府乐舞使用的规范性，反对僭越用乐。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富足，“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⑤。但经济富足了，人性中奢侈享乐的欲望也随之膨胀，汉武帝奢侈享乐自不必说，当时的宗室公卿大夫以下也都“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⑥。这种风气到危机四伏的武帝末、昭帝时期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权贵之家为满足其奢侈享乐，不惜设法攫取社会财富，更加剧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⑦。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权贵之家为满足其乐舞娱乐要求，在皇权式微之时，常有僭越用乐。而这正是强调以乐明礼的儒学者极力反对的。《礼记·乐记》就如此阐释五音关系：“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慝之音矣。”^⑧将君、臣、民分别比附为五音中的宫、商、角，强调五音的等级性。文学在《遵道》中则云：“师旷之调五音，不失宫商。”可见文学在此实暗用《礼记·乐记》，认为在五音关系中，宫、商关系是最重要的；由此推论，在政治伦理关系中，君臣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五音中蕴涵着君臣关系，乐舞中自然也包蕴着君臣之礼。基于对以乐舞明君臣之礼的认识，贤良、文学反对滥用乐府乐舞。《刺权》中，文学就对执国家权柄以乐府乐舞供私人娱乐的现象给予了猛烈抨击：“有司……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中山素女抚流徽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已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⑨其中提到“鸣鼓巴俞”，据《汉书·礼乐志》，西汉乐府有“巴俞鼓员三十六人”，颜师古注云：“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赅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⑩即便在哀帝罢乐府官时，巴俞鼓员也因其所奏之乐是“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而得到保留，可见巴俞鼓乐乃乐府用乐，且等级较高。文学在此对桑弘羊等权贵之家使用巴俞鼓乐给予批判，实与孔子批判季氏“八佾舞于庭”有相通之处，体现了对乐府乐舞使用的等级性的维护。

第三，认为利用乐府乐舞娱乐当有节制，反对当政者奢侈享乐。《荀子·乐论》曾指出：“夫乐者，乐也，

①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八《乐记》，第1534页。

②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论诽》，第299页。

③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遵道》，第292页。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崇礼》，第438页。

⑤⑥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

⑦ 《盐铁论》中，《散不足》集中揭示了奢侈之风盛行下的种种社会弊端，《取下》揭示了当政者取下无量造成的贫富苦乐悬殊的社会现实，均可参考。

⑧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七《乐记》，第1528页。

⑨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刺权》，第121页。

⑩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3、1074页。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舞娱乐乃人之本性需要，但如果放任人的乐舞享乐，“则不能无乱”，因此，必须对乐的使用加以节制，“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悞”^①。受这种儒家乐论传统的影响，并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贤良、文学也认识到“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但“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②。在社会经济衰退、奢侈享乐之风盛行、世风衰败的情况下，当政者有责任从自身做起，节制歌舞娱乐。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散不足》中，贤良倡议当政者以古为范，在乐舞使用上尽欢而已：“古者，土鼓由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箏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③由此，他们抨击了当时以钟鼓五乐、众多歌儿、鸣竽调瑟、郑舞赵讴来享乐的社会现象。在《力耕》中，文学还指出：“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④这里化用了《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⑤的典故，借夏桀因乐舞享乐无度以致亡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统治者利用乐府乐舞享乐当尚节俭、有节制的道理。

可以说，汉昭帝时期朝野士人对待乐府的不同态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乐府活动，而且还影响了此后西汉乐府的发展。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追求乐舞娱乐功能、肯定郑卫之声的观念，一度成为西汉宣、元、成时期乐府态度的主流。这可从《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找到证明。一是直至班固生活的时代，汉郊庙诗歌“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二是汉成帝时，修习河间雅乐的王禹弟子宋晔等上书，博士平当认为“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⑥。但这一以雅乐代郑卫之声以助教化的提议交给公卿审议，却未能通过；三是汉成帝时期，“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⑦。这些皆可见出当时追求乐舞娱乐功能者势力之大。由《礼乐志》记载也可看出，追求乐舞娱乐功能者，多为握有雄厚财力、崇尚个人享乐的权贵之家，但不可否认，这种乐府态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乐府的兴盛与歌诗创作的繁荣。如汉宣帝亲政后，在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的情况下，“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⑧，并招揽了刘向、王褒、张子侨、华龙、柳褒等文人和勃海赵定、梁国龚德等乐师，颇作歌诗^⑨，使西汉乐府历经昭帝时期的沉寂之后获得复兴^⑩。就今存汉乐府诗的内容而言，不少作品表达了对富贵的钦羨，对升仙延寿的渴慕，对乐舞的欣赏，这实际也是追求乐舞娱乐的观念在汉乐府诗创作中的反映。

相对于桑弘羊而言，在昭帝时期，霍光对乐府的影响应当更大。这一是缘于霍光在此期实际执掌行政大权，尤其在元凤元年（前80）一举铲除了桑弘羊、上官桀等政敌之后，他对乐府的态度当得以更顺利地贯彻到当时的乐府活动中。二是缘于霍光尽管“不学亡术”，但他反对滥用乐府乐舞、肯定乐府观风知俗的政教功能的态度却与儒家的礼乐观相吻合，一定程度接近于贤良、文学的乐府态度，在儒学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对乐府的态度更容易获得当时及后世文人的接受。汉昭帝时期乐府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四《乐论篇》，第379页。

②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本议》，第3页。

③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六《散不足》，第353页。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力耕》，第28页。

⑤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3页。

⑥⑦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2页。

⑧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⑨ 《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2821页。

⑩ 汉宣帝复兴乐府，不能排除其中有宣扬汉帝国国威、教化百姓的意图，但追求娱乐享受，乃是其中一个重要目的。

活动相对低迷,无疑与霍光的影响很有关系。而霍光与贤良、文学崇尚节俭的乐府观念,不仅对昭帝时期的乐府活动造成影响,而且还波及后世。如昭帝之后,西汉政府至少有两次因遭遇灾害、经济危机而裁减乐府乐人,如宣帝本始三年(前71)大旱,次年即令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元帝初元元年(前48)因民疾疫,也令减乐府员以振困乏^①。这两次诏减乐府乐人,前者可以说是霍光辅政下的直接结果,后者则是这一观念影响下的举措。并且,此后每当西汉社会经济困乏时,就会有士人进言节省开支,削减乐府机构,如宣帝神爵二年(前60),王吉就因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而上疏言得失,提出宜“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②。裁减乐府乐人,无疑会一定程度缩小当时的乐府规模,继而影响到乐府歌诗的创作活动。

文学、贤良反对僭越用乐,客观上符合统治者维护君臣等级的要求,因此也得到了此后统治者的接受。这主要体现在对僭越用乐者给予惩戒。如《汉书·韩延寿传》记载,汉宣帝时,韩延寿任东郡太守时曾“驾四马,傅总,建幢桀,植羽葆,鼓车歌车”。所谓“鼓车歌车”,据《汉书》孟康注:“如今郊驾时车上鼓吹也。”颜师古又云:“郊驾,郊祀时备法驾也。”^③可知这里描述的是韩延寿使用鼓吹乐的情景。然而,韩延寿用鼓吹乐是不合规范的。据崔豹《古今注》卷中:“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赐有功诸侯。”^④可知鼓吹乐在汉代乃天子用乐,一般人未经特许不得擅用。于是,萧望之就将此事列为韩延寿上僭不道的罪名之一加以弹劾,致使韩延寿被宣帝所恶而遭弃市之祸。

而反对侈靡乐舞享乐,追求乐府政教功能的观念,至成帝末年不断获得士人支持,终于酿成了汉哀帝即位诏罢乐府官的重大事件。哀帝罢乐府官固然有其不好音的个人因素,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危机,而朝野上下乐舞享乐之风却仍然盛行,以致发生权贵之家与人主争女乐、直接侵犯皇权利益的现象,乃是哀帝作出这一决策的主因。这在其《罢乐府官诏》中有明确说明:“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⑤哀帝希望通过罢乐府官振兴乐舞政教功能的企图尽管未能奏效,但此举对当时的乐府规模及乐府歌诗的创作、搜集与整理活动的打击无疑是极为沉重的。今存汉乐府诗恋情诗极少,恐怕也与这一举措有较大关联。

三 汉昭帝时期乐府的地位与影响

就今存文献看,尽管汉昭帝时期乐府开展了祠太一、祀山川、接待外宾等歌舞百戏活动,还承担着管理乐器、采诗观俗等职能,但由于经济实力衰退,促使这一时期的乐府活动远不及武、宣之世繁盛,歌诗创作也不及武、宣之世繁荣。在歌诗创作方面,此期朝廷没有专门组织文人为乐府创作新歌、制音度曲;今存文献中,可确定作于此期的歌诗作品也极少。因此有理由认为,昭帝时期的乐府是比较沉寂的,是夹在武、宣两个乐府高峰间的一个低谷。尽管如此,这时期的乐府在西汉乐府发展史上仍有不可忽视的承上启下地位。

首先,尽管汉昭帝时期乐府郊庙乐歌一仍武帝时旧贯而未有新制,但其对祀典传统及乐歌的保留,为宣帝时期乐府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在汉帝国面临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霍光深刻领会了汉武帝《轮台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4—245页;卷九《元帝纪》,第280页。

②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5页。

③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4页。

④ 《四部丛刊三编》第32册《古今注》卷中《音乐》,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4b页。

⑤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2—1073页。

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的精神，辅佐昭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在乐府活动方面，有节制地使用乐舞，取消了耗费巨大的巡游郡国活动，直到宣帝即位之初，“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①。然正如《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之后，《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十九章等“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②，昭帝时虽未有大规模巡祭活动，亦未曾组织专人为国家祀典制作新乐，但保存了高祖至武帝时期的祀典诗乐，同时也保留了与诗乐相配合的祀典传统，《汉书·霍光传》记载的霍光等奏废昌邑王刘贺的奏疏透露出这时期保留了祠太一的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昭帝时期乐府对祀典传统的保留及其乐歌的保存，使西汉郊庙乐的传统得到延续，无疑为宣帝时期的乐府复兴奠定了思想与艺术的基础。据《汉书·郊祀志下》：宣帝神爵元年（前61）“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③。不难想见，若无昭帝在位十三年间对武帝时期制定的祠太一等郊庙祀典传统的保留，汉宣帝“修武帝故事”且“颇作诗歌”就不会如此顺利。

其次，汉昭帝时期保持了派官吏巡行问民疾苦、采集民歌的传统，为汉乐府民歌的搜集与保存做出了贡献。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汉武帝扩大乐府机构职能，令人到各地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④。昭帝始元元年王平等巡行郡国问民疾苦，很可能会采集到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歌谣，这一巡行活动，可谓是对武帝时期派官吏巡行采风这一乐府传统的保留。《盐铁论·申韩》中，还通过御史之口，透露了昭帝时期乐府保存的民歌情况：“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⑤这里载录的百姓之歌，无疑是借用了武帝《瓠子之歌》最后一句“宣房塞兮万福来”^⑥，歌颂了武帝塞瓠子河决之功。由此亦可见出昭帝时期乐府对搜集民间颂德之歌的重视。

昭帝时期，不独有“宣房塞，万福来”之类颂德之歌，更有哀苦之辞。如《汉书》载录了三首创作于汉昭帝时期的歌诗，分别是李陵《别歌》、燕王刘旦《燕王歌》及其妻《华容夫人歌》。这三首歌诗都是歌者在感慨身世际遇时随口而歌，或作于异域，或作于诸侯王廷，并因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有关而被《汉书》记载，进而被收入到《乐府诗集》中。尽管它们是否被当时乐府收录并被演唱已无从得知，但由它们的创作至少可以推知，汉昭帝时期仍有新的歌诗作品出现。

其实，昭帝时期的乐府歌诗当不只今存文献载录的这些，《盐铁论·备胡》中，贤良云：“今山东之戍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⑦在戍卒怀归、老母忧子、思妇念远之际，必有缘事而发之歌产生；《取下》中，贤良又揭露道：“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窳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寥也。”^⑧在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里，亦必有感于哀乐之歌出现。这些歌诗，可能有部分被当时乐府收入，可惜文献散佚，这些作品未能保存至今。据《汉书·艺文志》，西汉民歌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

①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8页。

②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0页。

③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④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56页。

⑤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〇《申韩》，第579页。

⑥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13页。

⑦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备胡》，第446页。

⑧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取下》，第462—463页。

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这些歌诗多为武帝时期所作,但其中也可能有昭帝时期的作品。可以这么说,汉昭帝十三年间的乐府机构继续采集民歌,为后世延续这一传统,使汉代“民间乐府,实臻全盛”^①做出了贡献。

其三,今存汉昭帝时期歌诗,多情深而悲苦,体现了西汉人对社会政治的反思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令人玩味无穷。

就今存文献看,昭帝时期歌诗中,还有两首被认为是汉昭帝的作品。一是《西京杂记》卷一载汉昭帝创作了《黄鹄歌》:“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踔踔,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愧尔嘉祥。’”^②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收入此诗,并按云:“清商吴声曲有黄鹄歌,与此不同。”^③晋代王嘉《拾遗记》卷六记汉昭帝令宫女歌《琳池歌》:“昭帝始元元年,穿琳池(据《三辅黄图》卷四,当作“琳池”。笔者注),广千步。……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土人进一巨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犹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为船,木兰为舵,刻飞鸾翔鹤,饰于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帝乃大悦。”^④《古文苑》卷八收录此歌,并系于昭帝名下。由于这两首署名为昭帝的作品分别出自《西京杂记》、《拾遗记》,且都系于昭帝始元元年,其时昭帝方九岁,故其真实性颇受人怀疑。郑文先生《汉诗研究》就认为这两首诗都是赝品^⑤。尽管不能排除昭帝在黄鹄下太液池、与宫人泛舟琳池时有作歌或欣赏歌舞的可能性,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在此对这两首诗暂不作讨论,而仅就《汉书》保存的李陵《别歌》、燕王刘旦《燕王歌》及其妻《华容夫人歌》这三首完整而可信的作品进行探讨。

李陵《别歌》作于始元六年李陵送别苏武时,载于《汉书·苏武传》:“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殒。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⑥《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收录此辞。燕王刘旦《燕王歌》及其妻《华容夫人歌》均作于元凤元年刘旦谋反被告发之时,载于《汉书·武五子传》:“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冥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⑦《乐府诗集》卷八五《杂歌谣辞》有收录。

这三首歌诗都颇具楚骚风韵,其作者或是朝廷叛将,或是谋反的诸侯王及其家属,但它们都被收录并记载下来,这就很值得玩味。先看李陵《别歌》。此诗表面上是吟唱了一代名将兵败投降、家破人亡的内心悲苦,但透过诗歌的表层宣示义,实际展示了武、昭时期出征将士对家与国、政治利益与个体生命价值认识的矛盾冲突。李陵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作出了与苏武(其实也是与汉廷)“壹别长绝”^⑧的选择,选择了个体生命的保存。参以《盐铁论·取下》中贤良所说的“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② 《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89页。

④ 王嘉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8页。

⑤ 郑文《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⑥⑧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66页。

⑦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57页。

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也”^①之语，不难发现，经历了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政治价值与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已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思考。也许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李陵《别歌》有了被收录保存的价值。再看刘旦及其妻的两首歌。燕王之歌，抒发了一位即将因谋反被诛的诸侯王内心的悲哀：无贤士辅佐，国中一派死寂，沉痛绝望；华容夫人之歌，则表明了她将随夫而死的决心，哀婉情深。从政治价值的层面看，两首歌诗足以给当时企图谋反的诸侯王以警示；而从个人生命的体验看，由这两首诗歌，不难发现母子情、夫妻情较之政治权力更加可贵。无怪乎两诗唱出，“坐者皆泣”。

总之，尽管昭帝时期乐府相对沉寂，但其对此前乐府传统的保存，为宣帝时期乐府的中兴奠定了基础。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歌诗作品真切感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政治价值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值得珍视。

[作者简介] 龙文玲，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发表过专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等。

• 札记 •

《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

《柳宗元集》卷二有《愈膏肓疾赋》，但很多学者认为《愈膏肓疾赋》不是柳作，理由是“肤浅不类柳文”，如何陋认为“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愈膏肓疾赋》内容正如题解所言，是就《左传》著名的“膏肓”典故而论治国之理，与柳宗元许多文章所反复申述的一致。又《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般贤良忠臣奉行的原则。而《愈膏肓疾赋》却对此另提出一个补充而提高的思想境界：在“穷”的境遇下也要求“达”；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使桀纣那样的昏君治国。这就是柳宗元所景仰的《离骚》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表现这个新的论题，柳宗元对“膏肓”典故在细节说有四处修改。第一，《左传》原典故的起点是“公疾病”。柳文变异成为：“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明显的把有重病这个事实隐蔽了，而且把景公写成讳疾忌医的人。这是最关键性的改变。第二，原文在医缓说了“疾不可为也”之后，是“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如此结束了这个典故的叙述。而柳宗元《愈膏肓疾赋》增加了医缓说“针灸不达，诚死之端”一层，使原文的“疾不可为也”更具体化。第三，又增加了景公对医缓的讽刺：“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缓又有“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的辩驳。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第四，在“膏肓”典故中增加了以“忠臣”品名的人物：“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籍擗感叹。”这样就完成了否定历来“治国在天”的宿命论，而新立“治国在贤”的人定胜天论。文章以医缓对此忠臣的赞叹与鼓励而结束：“佐荒淫为圣主，保天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最后，说《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柳宗元《非国语下·医和》。它是对《国语·晋语八·医和视疾》而作否定评论的。可见《愈膏肓疾赋》不但不是伪作，而且应是柳宗元的一篇重要作品，受“伪作”说的影响，研究者对此篇都不注意。

（刘瑞明）

①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取下》，第463页。